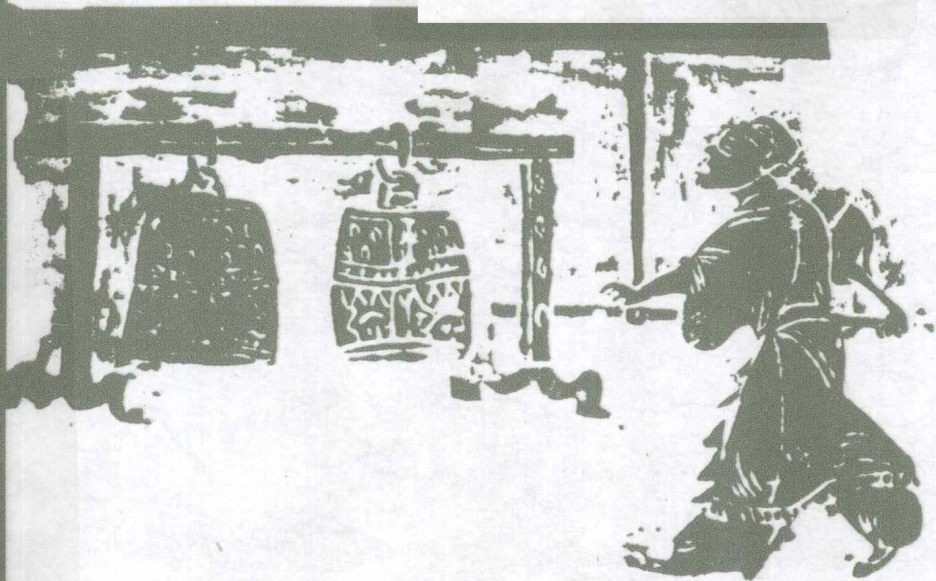


礼记解读



国
学
经
典
解
读
系
列
教
材
丁
鼎
撰

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礼记解读

丁 鼎 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礼记解读/丁鼎撰.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12529-9

I. ①礼…

II. ①丁…

III. ①礼记-研究-教材

IV. ①K8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4754 号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礼记解读

丁 鼎 撰

Liji Jied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2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38.75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43 000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纪宝成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的编写与出版，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学院的基本建设工程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国学院，被誉为顺应历史潮流、立德立功之举，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得到了各界的支持。我校已经在国学教育方面先行一步，更应该具备一种担纲意识，继续为推动国学教育向纵深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编写这套教材，不仅仅是为了适应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学的基本需要，也是力图振兴我国经典教育的一个具体步骤。经典著作如同岁月长河积淀、打磨出来的珍珠，在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熠熠生辉。自先秦以来，儒道法墨诸家所奠定的经典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形态，在两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进一步得到巩固与发展，形成了专门的学问与学科，是国学的主体。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典，乃是广义上的经典，不仅有儒家的经书，而且包括诸子与史部、集部的群书，它是中华文化与学术的集成和荟萃。至于其地位与作用，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宗经篇》所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这段话说明中国古代的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精华，其精神意蕴可以穿越时空而获得传承与光大。

在中国古代一直有读经的传统，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年间曾经废止读经，但这并不等于经典教育的废除，相反，它可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创造性地继承与更新。正如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所说：“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

这实在是一种进步。”这种看法显然是通达和正确的，值得今人加以借鉴。今天我们编写这套教材，也同样是为了更好地对学生经典学术教育，而绝不是简单地恢复读经。

国学的精华主要凝聚在经史子集四部的经典之中。“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和顺序是在《隋书·经籍志》中最后确定下来的。后来清代乾隆皇帝时编修《四库全书》，也是按经史子集四部来整理和编修的。四部不光是目录学的概念，而且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一般说来，经部、子部大略相当于现在的哲学学科，史部大略相当于历史学科，而集部接近于现代的文学学科，这说明国学与现代学科分类是可以互相兼容的，并不存在水火不相容的问题，当年的北大国学门与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是将四部与现代学科互相融合的。因此，传统经典教育与现代教育可以相得益彰，和谐相生。

不过，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学术重视不够，再加上厚今薄古思想及其理解中存在的偏颇，国学并没有在百年来的教育体系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到整体上的打压。进入新时期之后，国学与国学教育在社会各界倡导下，有了长足的发展。近年来，党和政府不断强调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强调尊重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随着整个中华民族复兴之局的到来，国学走向振兴的时机已经成熟。

我们所说的国学，是指运用现代立场与眼光、放在国际视野中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一门学问。它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是传统学术的内容；其二是用现代眼光来阐释、辨析与创新，是今人眼中的国学；其三把国学看作是全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来阐释、比较、辨析与创新，是国际视野中的国学。因此，振兴国学不仅是指光大传统，更主要是指激活国学的现代价值和创新能力，国学内在的融合中外、推陈出新的精神与能力，是我们今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进行文化创新时所要秉承的。对于传统经典的解读、阐释与辨析，毫无疑问是对于这种理论创新能力的激活，国学的生命力也在这种创新中得以生生不息，走向未来。因此，在国学教育中，这种经典的研读、阐释与辨析，是最要紧的门径之一。

中华经典相对于世界各国的文化特质来说，属于一种世俗文化，与世界其他各国的经典多属神学系统大不相同。比如，《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与学生思想观念的一部语录体的儒家经典，充满着世俗人情的意味。再比如《庄子》这本书，也很关注通俗的演绎。因此，认为经典高不

可攀的看法并不准确。不过，经典毕竟是经典。唐人编的《艺文类聚》对于经典的解释是“经也者，径也，言五路无所不通”，也就是说，经典承载着普适性道理，好比通向各条路径的通衢一样，它必然会去掉那些浮浅的东西，提升为哲理，有的在形态上不可能不深奥，如《周易》与《老子》这一类经典。因此，需要做一些解读与注释的工作。历来对于经典多有注释与解读，乃至于形成了专门的学问。

经典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早在上个世纪中叶，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就指出：“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程度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这几年，以《论语》、《庄子》等为代表的国学经典，通过现代传媒的推介与个体阅读，在国民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便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它也证明，国学经典教育在今天的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学方案中，经典教学类的课程占有很大比重，这也是它与现代文史哲专业教学的一个不同之处与亮点所在。为了满足国学院的教学需要，同时也为了顺应向海内外重张国学经典教育的时代大潮，我们编写出版了这套“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这套教材的学术定位，绝不是一般的教材，而是追求具有深厚学术底蕴，深入浅出，明快易读，从而履行中国人民大学追求一流，服务大众的职责。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编写体例上，我们要求体现出“国学经典解读”的宗旨。虽然古往今来，关于中国古代经典的解读类书籍浩如烟海，不胜枚举，但是以国学的精神与方法去解读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本系列教材集中从国学的角度去对传统经典进行解读，具体而言，就是立足于当代人文视野，贯彻义理、文章与考据融为一体的精神，打通现代文史哲三科的中间环节，通过解读与讲授，培养学生从经典中掌握国学知识，领会国学精神，提高治学能力，从而帮助学生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关于选择范围，有的是全本，有的则是选本，选本要求依据编写指导思想在字数范围内选择优秀的代表性篇目。

篇目注释与解读，是本套教材的重点所在，它由两部分组成：注释时力求准确严谨，同时行文上明快易懂。全篇解读则力求从传统经典中开掘出国学基本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在知识与精神方面获

得提升。所选书目，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学方案来选定。书的编注者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师为主，部分作者则为在国学院任教的人大其他学院的教师，同时也邀请到其他高校和科研部门的一些学者参与这项工作。这些教师在从事教学与科研的同时，倾心编注了这套教材，表现出对国学教育事业的热忱和投入。

本丛书已列入中国人民大学“985 工程”重大攻关项目，得到项目资金的支持。这对编好出好这套丛书，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大学在重振国学、弘扬国学方面所持的态度、立场和支持力度。

这套教材的编写，如同人大国学院其他工作一样，均具有筚路蓝缕的探索性质，尽管我们已在主观上尽了自己的努力，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仍不可避免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因此，我们期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使这套丛书在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共同推进国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是为序。

2008 年 6 月

编写体例说明

(一)《礼记》经文以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本(简称阮本)为底本,个别文字据他本有所改动,则在注释中加以说明。

(二)卷首导言对《礼记》的思想学术价值、《礼记》的编纂成书、《礼记》各篇的作者与写作年代、《礼记》各篇的篇名内容及其分类、《礼记》学的发展和演变、怎样学习《礼记》等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和探讨。

(三)各篇均由三部分组成:

(1)经文。经文除加标点符号外,还依据文意分为许多小节,并以阿拉伯数码标上序号,以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

(2)注释。除文字训诂之外,着重解释各种名物和礼仪制度,并为一些生僻字加注现代汉语拼音。此外,个别经文的校改,也在注释中加以注明。

(3)解读。置于每篇经文之下,解释每一篇题目的含义和由来,探讨各篇的作者及成篇时代,略述各篇的内容结构和思想价值。需要说明的是,《曲礼》与《檀弓》篇由于分为上、下篇,因而“解读”均置于下篇经文之下。

(四)由于篇幅所限,本书只在《礼记》49篇中选择了24篇进行解读。未选的篇目25篇:《曾子问》第七、《文王世子》第八、《丧服小记》第十五、《少仪》第十七、《杂记上》第二十、《杂记下》第二十一、《丧大记》第二十二、《祭法》第二十三、《祭统》第二十五、《哀公问》第二十七、《孔子闲居》第二十九、《奔丧》第三十四、《问丧》第三十五、《服问》第三十六、《间传》第三十七、《三年问》第三十八、《深衣》第三十九、《投壶》第四十、《冠义》第四十三、《昏义》第四十四、《乡饮酒义》

第四十五、《射义》第四十六、《燕义》第四十七、《聘义》第四十八、《丧服四制》第四十九。

（五）全书后附有主要参考文献，所列文献篇目是本书写作过程中主要参考和引用的书籍和文章篇目，也是读者进一步学习、研究《礼记》的津梁和门径。

目 录

编写体例说明	1
导言	1
曲礼上第一	15
曲礼下第二	47
檀弓上第三	69
檀弓下第四	121
王制第五	173
月令第六	210
礼运第九	265
礼器第十	285
郊特牲第十一	309
内则第十二	334
玉藻第十三	367
明堂位第十四	398
大传第十六	412
学记第十八	422
乐记第十九	434
祭义第二十四	469
经解第二十六	490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496
坊记第三十	503

中庸第三十一	519
表記第三十二	542
缁衣第三十三	563
儒行第四十一	582
大学第四十二	593
主要参考文献	608

导 言

一、《礼记》的思想学术价值

《礼记》是儒家十三经之一。作为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化元典之一，《礼记》在我国古代文化史、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多方面的价值。

《礼记》最重要的价值是其思想学术价值。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就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所创立的以“礼”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孔子之后，学派林立，“儒分为八”。但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者，除孔子、孟子、荀子留下较完整的著作外，其他各派儒家诸子的论著大都散佚。《汉志·诸子略·儒家》所列书目，大多失传；但有些篇章幸存于《礼记》中。如孔子后学思孟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子思的《子思二十三篇》，今已失传，但今传本《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和《缙衣》四篇都是子思的作品，这对于我们研究思孟学派的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再如儒家倡导礼乐文化，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乐”与“礼”并重，但先秦时期儒家学者关于“乐”的论著非常少见，而战国时期的孔门后学公孙尼子的论乐专著《乐记》则赖《礼记》而流传至今。《乐记》是我国古代一篇重要的乐学专著，蕴含着广泛而深刻的哲学、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内容，是先秦儒家乐教思想的总结和集大成之作，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礼记·礼运》所记述的“大同”、“小康”思想集中体现了《礼记》

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价值。本篇以子游问、孔子答的形式提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同”社会理想，进而说明礼制是“大道之隐”之后的“小康”社会的产物，然后着重叙述礼的起源、发展及演变，以至于完善的过程，并探讨了圣王制礼的根据、原则，礼与仁、义、乐、顺等的关系，以及礼制的运行规律。本篇“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化描述，体现了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这种“大同”的政治理想产生于2000多年前的中国，是极为可贵的。

《礼记》还保存了诸如《大学》、《王制》、《学记》、《经解》、《大传》、《孔子闲居》等许多蕴含着深邃思想哲理的学术篇章，这些都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名作，影响极其深远。通过这些篇章，可以窥见孔子后学不同派别的思想观点，包括有子游学派、子夏学派、曾子学派、子思学派、孟子学派、荀子学派等儒家内部的诸多派别的思想观点。从中还可以看到墨家、道家、农家、阴阳家等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的影响和渗透。由此而反映出《礼记》辑成的时代是一个对儒家各派求同存异，对诸子百家加以融合、吸收和改造的时代。《礼记》中的思想理论性内容深厚而丰富，它以礼乐为核心，涉及政治、伦理、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学说。因此，研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不能不研究《礼记》中所包含的思想学说的。《礼记》各篇虽独立成篇，内容多不相关联，不成系统，但如把《礼记》中有关篇章联系起来考察，大致可勾勒出孔、孟、荀之间乃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各派思想体系传承关系的轮廓。

《礼记》还有着很高的史学文献价值。不仅先秦时期社会生活中的冠、婚、乡、射、朝、聘、丧、祭诸礼在许多篇章中都有系统、完整的记述和阐释，而且《仪礼》中缺失的一些逸礼，如奔丧、投壶等礼也在《礼记》中有专篇阐释。甚至对于古代的封禅制度、明堂制度、宗法制度、昭穆制度、学校制度等许多在传世先秦文献中缺乏详细记载的典制，在《礼记》相关篇章中也有所论述，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礼记》尤为重视丧、祭二礼。因为丧、祭二礼集中体现了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结构、血缘关系以及与其相应的思想观念。如记录丧制、丧事、丧服的，有《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等；论述祭祀的，有《祭法》、《祭义》、《祭统》等。这些篇章既注意阐释礼之数（即礼之仪），对《仪礼》相关内容加以补充说明，更注意诠释“礼之义”，对诸礼的精神实质和用礼之目的加以阐述，为我们了解先秦礼制和儒家的

礼学思想提供了较丰富的文献资料。

另外，上自治国方略、社会发展规律，下至家庭准则，在《礼记》中都有专门篇章论述。如《王制》记载了古代封国、爵禄、职官、巡守、刑罚、养老、学校等各项制度，几乎涉及古代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虽有后人对古制的追记或理想化设计，但仍不失其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而《曲礼》、《内则》则是我国最早的两篇家训性质的著述，反映了古代贵族家庭成员彼此相处的尊卑关系，对于古代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也是研究上古社会生活史和家庭史的基本史料。

二、《礼记》的编纂成书

《礼记》，也称《小戴礼记》，是儒家“十三经”之一，是秦汉以前儒家各种礼学文献的选集，是一部有关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共有《曲礼》、《檀弓》、《王制》、《礼运》等49篇，其中《中庸》、《大学》两篇后来被朱熹列入“四书”。《礼记》反映的基本内容多系先秦古制，亦录有一些孔子言论或其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挥阐释。《礼记》各篇本来大都是解释“礼经”——《仪礼》的“记”，或解经所未明，或补经所未备，是附属于《仪礼》的参考资料性质的东西，是《仪礼》的“附庸”。

据说《礼记》一书是由西汉时期的礼学博士戴圣编选成书。孔颖达《礼记正义序》引郑玄《六艺论》曰：“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又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

根据《汉书·儒林传》和《后汉书·儒林传》的有关记述，可知汉初鲁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给瑕丘人萧奋，萧奋再传授给东海郡人孟卿，孟卿又传授给东海郯县人后仓（苍），后仓传授给沛人闻人通汉、庆普和梁人戴德、德圣。戴德为戴圣的叔父，当时号为大戴；戴圣号为小戴。当时大戴、小戴和庆普之学的影响较大，号称《仪礼》“三家之学”。三家之学在汉宣帝时都立于学官，设博士。二戴作为立于学官的礼学专家，自然会根据自己的学术志趣从前世流传下来的众多礼学文献中选编成不同的教本，用以教授学生，于是便有了流传至今的戴德与戴圣所纂辑的两种《礼记》选编本。由于戴德为戴圣的叔父，因而戴德的选编本85篇便被称为《大戴礼记》，戴圣的选编本49篇便被称为《小戴礼记》。又由于

《小戴礼记》的学术地位比较高，影响比较大，因而便被后世径称为《礼记》。

东汉马融传《礼记》之学，郑玄受业于马融，为《礼记》作注。郑玄《礼记注》问世后，逐渐为世人所重。到了唐代，《礼记》取得了经典的地位，并取代《仪礼》成为“五经”之一，由“附庸”而升为“大国”。

关于二戴《礼记》的关系，旧有“小戴删大戴之说”，至今还有人信从。此说始于晋代陈邵。唐陆德明《经典释义·序录》引陈氏《周礼论序》云：“戴德删古《记》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述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后来《隋书·经籍志》也附益其说，并说《小戴礼记》原为46篇，汉末马融又补入《月令》、《明堂位》、《乐记》3篇，于是便成为49篇。

考诸有关史籍，便知陈邵之说纯为无稽之谈，根本没有文献学依据。汉魏诸儒从未说过《小戴礼记》是由《大戴礼记》选编而成。由于《大戴礼记》原本85篇，而至隋、唐时已残缺不全，至今只剩下40篇；又由于《汉书·儒林传》服虔注曾引《大戴礼记·曲礼》，《诗经·摽有梅》孔疏曾引《大戴礼记·文王世子》，《太平御览》卷五百一十九所引《五经异义》中有《大戴礼记·礼器》之篇名，而《曲礼》、《文王世子》、《礼器》也均为《小戴礼记》之篇名，因而有人据此而认为《大戴礼记》亡佚的篇章即为《小戴礼记》所删取。究其实，此说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大戴礼记》亡佚的篇章有许多是《小戴礼记》所没有的。如《礼记·曲礼》孔疏曾引《大戴礼记·王度记》，《诗经·沮汾沔》孔疏曾引《大戴礼记·辨名记》，《诗经·灵台》孔疏曾引《大戴礼记·政穆篇》，《北堂书钞》卷九十三引过《大戴礼记·谥法篇》，《仪礼·少牢馈食礼》郑《注》引《太庙礼》一条，贾疏谓该条出于《大戴礼记》，而上述《王度记》、《辨名记》、《政穆篇》、《谥法篇》与《太庙礼》等《大戴礼记》亡佚的篇目都是《小戴礼记》所没有的。由此可见，《大戴礼记》亡佚的篇章并非为《小戴礼记》所删取。从而可知，《小戴礼记》不可能是从《大戴礼记》选编而成。

实际上，《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当是分别由戴德、戴圣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百三十一篇”礼学之《记》及前世流传下来的其他礼学文献中选编而成。

在疑古惑经思想影响下，宋人开始怀疑二戴是大、小戴《礼记》的编纂者。陈振孙曾认为《大戴礼记》“殆后人好事者采获诸书为之……非戴

德本书也”（《直斋书录解題》卷二）。清儒毛奇龄《经问》卷三则以《汉书·艺文志》不载二戴《礼记》，而认为二戴《礼记》并非编成于西汉时期。近人洪业、王文锦、钱玄等先生均认为二戴《礼记》并非二戴所编纂，其成书时间在郑玄之前的东汉时期。^① 他们否定大、小戴编纂二戴《礼记》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几条：第一，《汉书·艺文志》中未提及二戴《礼记》；第二，戴圣是今文礼学家，但《礼记》中不仅今古文不分，而且还收有出于古文《逸礼》的《奔丧》、《投壶》两篇；第三，许慎《说文》引用《礼记》均冠以“礼记”二字，唯独引用《月令》时冠以“明堂月令”，可见许慎所见《礼记》未收《月令》，然则今本《礼记》非戴圣所编。

对于上述诸人的怀疑，当代学者杨天宇先生作了有力的辩驳。首先，《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刘歆《七略》“摘其要”编成的，而《七略》则是摘取刘向《别录》以为书，《别录》详于《七略》与《汉志》。故《汉志》未载之书，不等于《七略》未载，更不等于《别录》亦无其书。《经典释文·序录》明云“汉刘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同”，可为确证。而且西汉时代的书，《汉志》未收录的甚多，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就是显例。其次，二戴虽然属今文学派，但他们生当今、古文壁垒未成的武、宣时期，他们所抄辑的礼学资料选编本中混有古文经记，并不足为怪，不能以此否认二戴的编选权。复次，《说文》引《礼记》并非均冠以“礼记”二字；而且《说文》引《月令》也并非皆冠以“明堂月令”四字，也有冠以“月令”者。因此不能以《说文》引《礼记·月令》冠以“明堂月令”的情况而否认《礼记》为戴圣的纂辑。^②

此外，还有两条材料可以说明二戴《礼记》并非东汉时方纂辑成书。其一，《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刘向《别录》说：“孔子见鲁哀公问政，比三朝，退而为此《记》，故曰‘三朝’，凡七篇，并入《大戴记》。”其二，《三国志·蜀志·秦宓传》裴松之注引刘歆《七略》曰：“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记》七篇，今在《大戴记》。”可证西汉时著名的文献学家刘向、刘歆均亲眼见过《大戴礼记》，从而可证《大戴礼记》早在西汉时即已纂辑成书。

① 参见洪业：《礼记引得序》，《洪业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王文锦：《经书浅谈·礼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钱玄：《三礼通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② 参见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152~160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三、《礼记》各篇的作者与写作年代

三礼之中,《仪礼》、《周礼》二礼均有较严密、完整的写作体例和理论框架,而《礼记》则是一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籍,其各篇的写出于众手,没有严密、完整的写作体例和理论框架。《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类载“《记》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这些《记》都是解说《礼经》之作,传世的大、小戴《礼记》主要就是选自于这些《记》。因而可以推断《礼记》中的大多数篇章可能就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后学的作品。也就是说《礼记》49篇的基本内容形成于先秦时代,是由孔门弟子、后学传下来的。

关于《礼记》各篇的作者,大多不能确考。古代学者也指出了一些篇章的作者,但其中也有不同的说法。如《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礼记·儒行》郑玄注曰:“《儒行》之作,盖孔子自卫初反鲁时也。孔子归至其舍,哀公就而礼馆之,问儒服而遂问儒行,乃始觉焉。言‘没世不敢以儒为戏’,当时服。”《隋书·音乐志》引梁沈约说:“《中庸》、《表記》、《坊记》、《缙衣》皆取《子思子》。”按《子思子》是孔子之孙孔伋(字子思)的作品集。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曰:“《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后人通儒各有损益,故《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缙衣》是公孙尼子所制,郑玄云《月令》是吕不韦所撰,卢植云《王制》是汉时博士所为……”

由于《礼记》各篇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而且《礼记》各篇在流传过程中也有所修改或增补,甚至在个别篇章中混入了秦汉人增补的一些语句或内容。因而唐宋以下,就有学者怀疑《礼记》中有一些伪托之作。朱熹《朱子语类》认为:“《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礼记》乃秦汉上下诸儒解释《仪礼》之书,又有他说附益于其间。”^①“大抵说制度之书,惟《周礼》、《仪礼》可信,《礼记》便不可深信。”^②清人孙希旦认为:“《礼记》固多出于汉儒,而此篇(指《祭法》篇)尤驳杂不可信。”^③现代学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认为《大学》、《祭

① 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四,21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② 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六,22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③ 孙希旦:《礼记集解》下册,11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